

《文心雕龙》小说论琐议

马骁英^①

(辽宁大学文学院, 沈阳 110036)

摘要:《文心雕龙》中大量的小说论因子,散见于其《诸子》《史传》《宗经》《诸隐》等各篇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文心雕龙》中的小说论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曲缀”之“序”——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的叙述模式、作为历史小说萌芽的史传文学的虚与实、《文心雕龙》的小说地位论与小说观。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文心雕龙》中的小说论因子,是时代与文化共同催生的必然产物,具有深远的肇源意义。

关键词:文心雕龙;刘勰;小说论;叙事文学;史传文学;小说地位;小说观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72(2015)04-0105-06

《文心雕龙》所诞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脱离草创、蒙昧状态,走向繁荣、兴盛,影响力愈益增强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古典小说走出了战国、秦汉时代的初兴起步阶段,从肇始滥觞期的昆山片玉,一跃而头角峥嵘地蔚成大国,极一代之奇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古典小说,数量远迈前代,题材广泛多样,现实性和时代感大大增强,想象力和表现力显著提高,开始出现较为完整的情节结构,开始注意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这一时期的中国古典小说按其内容可分为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两大类,在这两大类中分别出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两座历史性丰碑——东晋干宝《搜神记》、南朝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二者皆为炳耀当时、沾溉后世的千古杰作。

在小说文体蓬勃发展、繁荣兴盛的文化背景下,小说创作的艺术精神、艺术手法融入了当时其他各种文体的写作之中,使各种文体都或多或少地渐染了小说创作的斑斓的艺术色彩。《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对其他各种文体的论述与阐释,无可避免地、自觉不自觉地会论及蕴含在其他各种文体中的小说创作的艺术范畴、艺术手法和艺术精神,这些对其他各种文体中小说因素、小说特征、小说色彩的论述散见于《文心雕龙》二十篇文体

论之中。而《文心雕龙》之所以并未为小说文体设置专篇专论,是由于《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独特的小说地位论和小说观。刘勰的这种独特的小说地位论和小说观,深刻地影响了《文心雕龙》中的小说理论因子的生成与形态。

一、“曲缀”之“序”——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的叙述模式

小说文体,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叙事文学。叙事文学,都具有特定的叙事结构、叙事层次、叙事模式、叙事逻辑、叙事之序。

《文心雕龙》的小说理论因子,清晰地指明了小说文体的叙事文学性质。《文心雕龙》在其《诸子》篇中,服膺《汉书·艺文志》的“小说”观点,将被《汉书·艺文志》列为小说家代表作之一的《青史子》作为小说文体的唯一典型代表,体现了自己的“小说”观点与《汉书·艺文志》的高度一致。《汉书·艺文志》认定作为小说家代表作之一的《青史子》属于“古史官记事也”^{[1]1744-1745},是古史官记录杂闻逸事的叙事之作。而《文心雕龙·诸子》将《青史子》作为小说文体的唯一典型代表,可见,在《文心雕龙》看来,

^① 收稿日期: 2015-04-16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3CZW013)

作者简介: 马骁英(1984—),男,辽宁海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小说文体从总体概况上皆如《青史子》，属于叙事文学。《文心雕龙·诸子》进一步指出，诸子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基本上皆可归类为叙事性文学。诸子文体中的小说性因素，“或广记异闻，供文家之采擷，或虚述逸事，出入子史之途”^{[2]556}，大多为被诸子文体引为例证的用来增强诸子文体说服力的叙事性寓言，均属于叙事文学的范畴。

《文心雕龙》高度重视叙事文学的叙事之序。《文心雕龙·史传》以《左传》为叙事文学的典型范例，论述了其“贯四时以联事”^{[3]283}的“缀事”^{[3]285}之序，阐释了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纪远近，别同异”^{[2]564}的叙事模式，分析了其“贯申春夏秋冬四时之统序，以联叙世事”^{[2]564}的叙事逻辑，探究了其“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3]295}的叙事层次，研讨了其“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先经后经，依经错经，附经缀事，以年为次，日月先后，秩然可寻”^{[2]583}的叙事结构。

《文心雕龙》指出，叙事文学的最根本的叙事手段是“原始要终”^{[3]284}。《文心雕龙·史传》认为，叙事时经常面临的是“事积则起讫易疏”^{[3]286}的复杂局面，需要叙述的事件、头绪积累得过于繁冗庞杂，以至于容易造成对事件起因后果、来龙去脉的疏忽遗漏，极易造成“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2]606}的不良结果。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叙事文学急需“寻繁领杂之术，明白头讫之序”^{[3]287}来作为破解叙事困局的手段，而最根本、最有效的破解困局的叙事手段就是“原始要终”，通过“原穷其事之初始，要会其事之终末”^{[4]316}，“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根本”^{[3]291}，来系统梳理、考察事件发展的起讫、脉络，全面探讨事件发展的始末、规律。

《文心雕龙》在其《史传》篇中，反复强调叙事文学凭借甄别取舍材料以驾驭庞大复杂叙事规模的“甄序”^{[3]284}之功，反复赞叹历代叙事文学杰作的“得事序”^{[3]284}的可贵。《文心雕龙·史传》进一步指出，叙事文学实现“得事序”的途径是“以审正得序”^{[3]285}，依靠审慎而正直的叙事道德

态度、叙事伦理观念来通观、衡量事件宏观发展整体和微观脉络走向，“定其臧否，徵其善恶”^{[3]300}，进而实现“得事序”。

《文心雕龙》指明小说文体属于叙事文学，《文心雕龙》又高度关注叙事文学的叙事之序，那么，对于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文体的叙事之序，《文心雕龙》又是如何论述的呢？《文心雕龙》在其《诸子》篇中，选取《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代表作之一《青史子》作为例证，精奥地指出，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文体的叙事之序，可以概括为——“曲缀”^{[3]308}，委曲婉转、千回百折、跌宕起伏、错综缠绕地将事件联缀起来，加以叙述。“曲缀”之“序”，是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文体的叙述模式。

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文体的“曲缀”之“序”，其具体情形究竟如何呢？《文心雕龙》以中国最早的叙事文学之一《春秋》中的灾异类小说性因素为例，指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曲缀”的最根本的基础是叙事中详略与先后的无尽变化。《文心雕龙·宗经》云：“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鹗，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3]22}《春秋经·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鹗退飞过宋都。”^{[2]72}晋范甯《春秋谷梁传集解》：“石无知而陨，必天使之然，故详而日之。鹗或时自欲退飞耳，是以略而月之。”^{[2]72}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此处‘详略成文’，盖本范甯之说，以月日并记者为‘详’，仅记月者为‘略’。”^{[2]72}《春秋公羊传·僖公十六年》：“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礧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鹗？六鹗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鹗，徐而察之则退飞。”^{[2]71}《春秋左传·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鹗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杜预注：今兹，此岁），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5]386-387}《春秋经·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春秋公羊传》：

“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两观微也。然则曷为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主灾者两观也。时灾者两观，则曷为后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春秋谷梁传》：“其不曰雉门灾及两观，何也？灾自两观始也，不以尊者亲灾也，先言雉门，尊尊也。”杜预《春秋左传注》：“雉门，公宫之南门。两观，阙名也。”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论》：“雉门，据《周礼·天官·阍人》郑玄注，为天子五门中之三门，在库门之内。”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雉门两观，皆天子之制，门为其主，观为其饰，故微也。”詹鍈《文心雕龙义证》：“雉门，鲁宫南门。两观，是宫门外左右二台上的楼，附属于雉门。灾实从两观起，如曰雉门灾及两观，便与事实不符，倘曰两观灾及雉门，按《谷梁传》的解释，两观卑，雉门尊，卑不可以及尊。无论按照《公羊传》或《谷梁传》的说法，都是经文先言雉门，后及两观，并且把灾字放在两观下面，暗示两观主灾。这样既合事实，又显示雉门重要，两观不重要。此处‘先后显旨’，有分别轻重或尊卑的用意。”叙事文学中的灾异类的小说性因素，通过叙事过程中的详略、先后的有意味的无尽变化，创造出委曲婉转、婉章志晦、诱人深思、抽丝剥茧、隐微暗示的叙事艺术效果，极为典型地成功体现出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文体的叙述模式——“曲缀”之“序”。

二、作为历史小说萌芽的史传文学的虚与实

《文心雕龙》所大力论述的史传文学，实际上是后世“汪洋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的历史小说的萌芽。而史传文学中广泛存在的“虚”与“实”“奇”与“信”的问题，实际上是，后世历史小说中普遍存在的“七实三虚”问题的肇始和滥觞。

在《文心雕龙》的理论视角中，历史小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文心雕龙》在其《诸子》篇中，将性质上属于“古史官记事也”的《青史子》作为先秦小说文体的唯一典型代表，这体现了《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的科学而客观的理论观点——历史小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最早的小说

形态之一。

《文心雕龙》在其《史传》篇中指出，作为历史小说萌芽的史传文学，通过“记事”和“记言”来发挥伦理劝谕功能和道德规诲功能，在编叙历史人物行为、活动、言论的过程中，隐含对历史人物善恶、功过、忠奸的评判，“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记功司过，申以劝戒”，“明其为善，病其为恶，立其善风，扬其善声”，以警醒后世，达成“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的恒久效果和深远影响。史传文学的这种伦理劝谕功能和道德规诲功能，完整地延续和保存到了作为其后身的历史小说之中。历史小说在其小说叙事之中，通过针砭昏暴、颂美仁孝、惩恶劝善、褒忠贬奸，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伦理美刺传统，完成了小说艺术劝惩功能的具象化实现。艺术的劝惩之效，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而达成的。史传文学，格外注重以历史人物为叙事中心，专门为历史人物立传，利用“传以委曲细事”的独有特点，通过“显隐必该，洪纤靡失”的叙事方式，在历史细节的流淌闪现、历史人物的举动唇吻之间，捕捉历史人物的独特性格，展现历史人物的生动形象，实现了“人始区详而易览”的历史人物形象刻画的良好效果。历史小说完美地继承了史传文学对人物形象的高度关注。历史小说延续了史传文学“显隐必该，洪纤靡失”的刻画人物方式，特别善于通过点滴的细节描写来雕琢、刻画、塑造鲜活生动的小说人物形象。历史小说甚至直接继承了史传文学刻画人物形象的文体外在躯壳形式，在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批小说作品中，有很多优秀的精于刻画人物形象的作品就是以“某某传”的形式出现的。

对后世历史小说影响最深的，是史传文学中的虚与实的问题。《文心雕龙》指出，史传文学高度强调虚与实的统一、奇与信的统一、“爱奇反经”与“实录无隐”的统一、“偏驳不伦，疏谬少信”与“详实准当”的统一。史传文学“爱奇反经”之“虚”，体现为指导写作的主旨思想上的“是非颇谬于圣人”“薄五经”“不专纯于圣人之道”，体现为统合、运用写作素材上的“至于滑稽、日者、

货殖、游侠、九流,皆多爱而不忍弃,并序而录之”。史传文学“实录无隐”之“实”,体现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叙事态度,体现为“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的叙事追求。史传文学“偏驳不伦,疏谬少信”之“虚”,体现为偏颇驳杂、不求伦次、无意信实的叙事风格,体现为“文多排叠,喜志灾祲”的叙事偏好,体现为“波屡云委,灏瀚苍郁”的叙事艺术世界。史传文学“详实准当”之“实”,体现为“讨论众书,缀其所闻,通综上下,旁贯庶事”的叙事方式,体现为“文质事核,言辞简质,叙致温雅”的叙事艺术境界。史传文学将“爱奇反经”“偏驳不伦,疏谬少信”之“虚”与“实录无隐”、“详实准当”之“实”,高度地统一起来,使“虚”与“实”、“奇”与“信”相依共存、互补共生、对立统一、交汇浑融,达到了“文质辨洽”、虚实融洽合宜、“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的“文艳”与“质直”完美合一的叙事艺术妙境。后世历史小说充分继承了史传文学的虚实合一、奇信浑融的叙事传统,做到了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在小说中创造了“七实三虚”的多彩的叙事艺术世界。

作为历史小说萌芽的史传文学的实中有虚、引虚入实的现象的根源究竟在何处呢?《文心雕龙》在其《史传》篇中认为,这种根源在于“述远则诬矫”,对古远时代史实的诬妄不实的矫饰虚构。《文心雕龙·史传》详细分析指出:“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文心雕龙》深刻指明,追述古远时代的史实,时代越久远就越会滋生虚构,广大受众中普遍存在的世俗的欣赏心理是猎奇、爱奇的,越是虚构得奇诡谲怪就越是受人喜爱,完全不顾历史的真实,于是,为了迎合受众猎奇心理,为了显示自身的博奥丰赡,某些史传文学,记述传闻总想把事情夸大,越是叙述远古事迹就越是想记叙得详细,抛弃平凡的真实,选取奇异的虚构,任意牵

合,附会杂说,越是旧史不曾记载的,就越是想通过虚构多加叙述,这就是史传文学之“虚”的深层根源。而这种深层根源,诱发出了史传文学中的大量的小说性因素。范文澜云:“司马迁撰《史记》,远推五帝,作《五帝本纪》。张衡欲纪三皇,司马贞本其意补《三皇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徐整《三五历记》,皆论三皇事,亦记盘古神话。宋胡宏撰《皇王大纪》,上起盘古。盘古本西南夷之神话,自后汉渐流传于中原。愈后出之史家,其所知乃愈多于前人,牵引附会,务欲以古复有古相高。”詹鍈云:“后人说古史者,爱奇好异,实多荒诞不经之说,非失之‘弃同即异’,即不免‘穿凿傍说’,如《汲冢琐语》《穆天子传》《山海经》等,林林总总,不可胜数。”后世历史演义小说,从史传文学的“爱奇反经”“莫顾实理”的“虚”的因素中,汲取了无限的创作素材营养,获得了不竭的创作灵感源泉。例如,《史记》中所记载的极具传奇性质的赵氏孤儿之事、吕不韦与始皇生母赵姬之事,均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所津津乐道、广为利用,实为史传文学衍生出历史小说因素的典型案例。

三、《文心雕龙》的小说地位论与小说观

实事求是地说,小说在《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视角中,其最根本的地位和最核心的属性,首先并不是一种文学文体,而是作为《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之一的一种思潮流派。在小说作为文学文体蓬勃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宏观背景下,刘勰有意地忽视、抑制小说的文学文体地位与属性,故意地崇尚尚古,刻意地服膺于《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之说,将小说的根本地位与核心属性首先定位于一种思潮流派。

《汉书·艺文志》在总结先秦思想流派时,分列诸子十家: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阴阳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纵横家者流、杂家者流、农家者流、小说家者流。《汉书·艺文志》在小说家者流的条目下,收录小说家共“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其中第四家为《青史子》,

云：“《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文心雕龙》完全地继承了《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在其《诸子》篇中，分列诸子十家，并为每家都举出一个代表。例如，儒家举出孟轲，道家举出庄周，而对于小说家则举出了《青史子》作为其代表。《文心雕龙·诸子》云：“逮及七国力政，俊义蜂起，孟轲膺儒以馨折，庄周述道以翱翔，……青史曲缀以街谈，……并飞辩以驰术，……”《文心雕龙》明确地将以《青史子》为代表的小说，看作是作为与儒、道等家同列的诸子十家之一的一种思潮流派。

《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范文澜云：“《汉书·艺文志》列诸子为十家，而云‘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其一家即小说家也。”《汉书·艺文志》认为，在诸子十家者流之中，前九流是“可观”的于国有益、于民有用之辞，而九流之外的小家者流则是不“可观”的无益无用之辞。《文心雕龙》完全地延续了《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在其《谐隐》篇中写道：“九流之有小说”，明确指出，小说的地位是，在诸子十家之中，位居前九家者流之后的最末流的一个思潮流派。

《文心雕龙》对于小说“体用”的总体观念，也完全因袭自《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豸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如淳注：“《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稗官，小官。”《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之“体”，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细碎之言”“刍豸狂夫之议”，小说之“用”，是“出于稗官”，偶尔“或一言可采”，以“知闾巷风俗”。《文心雕龙》全面地、忠实地继承了《汉书·艺文志》的小说“体用”观，在其《谐隐》篇中写道：“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

交乎！”《文心雕龙》指出，小说之“体用”，与诙谐文学之“体用”完全一致，小说之“体”是“辞浅会俗”“譎辞饰说”“谬辞诋戏”，小说之“用”是“稗官所采，以广视听”“颇益讽诫”。不难发现，《文心雕龙》对小说“体用”的阐释文字，一脉相承地、完全地延续继承了《汉书·艺文志》的小说“体用”观。基于这种对小说评价不高的小说“体用”观，《文心雕龙》进一步指出，小说就如谐隐之类诙谐文学一样，为文章末流，不宜师法、研习、涉猎过深，不宜使其升堂入室以当金石之交，否则就会陷入与淳于髡、优旃、优孟等倡优弄臣之流为伍的境地。正是由于这种对小说评价偏低的小说观，《文心雕龙》才并未为小说设置专篇专论，而是使自身全书中的小说理论呈现出零散的理论因子形态。对于《文心雕龙》的小说与诙谐文学“体用”相同的观点，刘永济先生的一段论述，至为允当。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云：“舍人此书所涉文体，封域至广，独不及小说。惟《诸子》篇有‘《青史》曲缀以街谈’一语耳。《汉书·艺文志》，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覈论其实，固由文士之狡狴，亦乃赋家之旁枝，或广记异闻，供文家之采擷，或虚述逸事，资客座之谈谐，大抵出入子史之途，兼揽诗赋之警，恣意自游，最为轻利者也。有于滑稽谑戏之中，亦寓讽戒之意，尤与谐隐之文，沆瀣相通。舍人谓‘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虽非专论小说，而小说之体用，固已较然无爽，不得以罅漏讥之也。”刘永济先生慧眼独具地点明，在《文心雕龙》的观点看来，小说之“体用”，是“于滑稽谑戏之中，亦寓讽戒之意，尤与谐隐之文，沆瀣相通”，《文心雕龙》在与谐隐之类诙谐文学的比较分析中，展现了自己的小说“体用”观。

余论

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中的小说理论因子的出现与成就，与作者刘勰本人的佛教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不容忽视的关系。《梁书·刘勰传》云：“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

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刘勰早年投奔定林寺的佛教大师僧祐，助其整理佛经，在整理、研习、归类佛经的过程中，逐渐精于佛学，博通佛教经论，他晚年也最终幡发为僧，圆寂定林，因此可以说，佛教文化对刘勰本人的影响是极为巨大而长久的。众所周知，佛教典籍之中，存在着大量的因果、征验、报应、神异等因素，佛教文化的这些因素无疑会在刘勰的思想意识中留下

深刻的印迹，无疑会对刘勰的艺术理论构建产生具体的影响。在佛教文化中的神异因素的影响之下，刘勰格外地关注了各个文体中的尚“奇”贵“虚”的小说性因素，并作出了精彩深刻的阐释。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文心雕龙》中的小说理论因子，实际上是宏观的时代文化土壤与微观的个人文化背景共同作用、交互影响而最终产生的丰硕成果。

参考文献:

- [1] [汉]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 詹鍈. 文心雕龙义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3] [南朝梁] 刘勰. 文心雕龙 [M]. 范文澜, 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4] [魏] 王弼, 注. 孔颖达, 疏. 周易正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5] [周] 左丘明, 传. 杜预, 注. 孔颖达, 疏. 春秋左传正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孙希国)

Novel Elements of *Wen Xin Diao Long* (文心雕龙)

MA Xiao - y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plenty of novel elements in *Wen Xin Diao Long* (文心雕龙) which are scattered in articles such as *Zhuzi* (诸子), *Shizhuan* (史传), *Zongjing* (宗经), and *Xieyin* (谐隐). These elements have theoretical valu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subject about the novel elements of *Wen Xin Diao Long* (文心雕龙) can be studied in terms of the narrative mode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fictitious style and realistic style of historical novel and the position of *Wen Xin Diao Long* (文心雕龙) as a novel and the conception of a novel. It is found that the novel elements of *Wen Xin Diao Long* (文心雕龙) are an inevitable product of the time and the culture.

Key words: *Wen Xin Diao Long* (文心雕龙); Liu Xie; novel theory; narrative literature; historical literature; position of novel; conception of novel